

“双一流”建设的阶段性成效评估与问题剖析

——基于 36 所高校《“双一流”建设 2018 年度进展报告》的内容分析

高耀，王莉莉

(天津大学 教育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双一流”建设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策性议题，对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阶段性成效进行评估是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战略中需要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基于 36 所高校《“双一流”建设 2018 年度进展报告》文本，采用解读式内容分析法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阶段性成效主要体现在学科结构不断优化、人才队伍引育结合效果凸显、人才培养成效显著、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大学文化建设有序推进、国际交流合作持续开展等方面；与此同时，“双一流”建设中也存在高层次师资队伍建设矛盾突出、学科建设内生动力不足、制度体系建设不完善及服务社会需求能力有待加强等方面的问题。在下一步的“双一流”建设过程中，高校应注重强化价值引领，激发内在动力，不断提升服务国家和社会需求的能力。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估；问题剖析；进展报告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双一流”建设战略是我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一项重大而长远的战略决策，是开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新征程的必然选择，是我国实现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谋划，也是开辟高等教育一流建设新道路的宏伟设计。“双一流”建设战略自提出伊始，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从国家、各地区、各高校的政策导向来看，“双一流”建设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1]。2015 年 10 月 24 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自此拉开了我国“双一流”建设的序幕。2017 年 1 月 24 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建设实施方案（暂行）》，公布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随后，各省（市、区）也相继出台本地区“双一流”建设方案。为回应国家这一战略举措，“双一流”建设高校纷纷制定本校“双一流”建设方案。2018 年 2 月，教育部对 42 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建设方案进行了批复，各高校纷纷以目标为导向开展一流大学建设工作，2018 年成为我国高校开展“双一流”建设的“元年”。

“双一流”建设政策自制定到颁布、实施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始终扮演着“主导者”角色，高校自主力量式微，因此，“双一流”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国家行为。我国作为高等教育“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发展路径上容易采取“追赶”已进入现代化之列国家的策略和做法，所谓“追赶”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侧重于横向比较和特定问题导向^[2]，极易忽视

发展的内部规律。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建设伊始，便面临建设成果指标化、教育功利主义盛行等多重挑战。

随着“双一流”建设战略的持续推进，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目前，学者对“双一流”建设政策的研究主要涉及“双一流”建设政策的价值取向、共性特征、突出矛盾及推进策略等方面，下面对一些代表性的文献进行简单梳理。吴小玮通过对各省级政府出台的“双一流”建设专项政策或与之相关的政策文件进行内容分析发现，不同省域的“双一流”建设方案较为一致的体现了科学定位、分类发展、延续重点的设计原则，分别探索出学科驱动、平台建设、整体推进、高校引入这四种典型推进策略^[3]。褚照锋基于 24 个地方政府的“双一流”政策文本，同时结合我国教育事业“十三五”规划等与“双一流”政策有关的文件，对“双一流”政策的文本结构和主要实施策略展开研究^[4]。苏林等人采取政策内容分析的方法，总结省域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政策的三大突出特点，深入探讨省域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政策中存在的重表象而轻内涵、重投入而轻培育、重规范而轻特色三大典型矛盾，提出理性推进省域“双一流”建设的策略选择^[5]。彭华安基于政策工具和建设要素的二维分析框架，对《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进行内容编码，并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发现在“双一流”建设政策工具运用的选择和使用方面呈现政策工具组合程度低、结构有待优化，建设要素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具有差异性，政策体系不健全、有效性不高的特点^[6]。张伟等通过对 26 个省份“双一流”建设的省际政策文件文本分析发现，省际“双一流”建设政策文本具有建设实施以“项目”为主要抓手、学科建设问题统领“双一流”政策人才资源成为战略性资源等共性特征，此外，各省政策在建设投入力度、创新实施力度等方面也存有显著性差异^[7]。李春林等人则选取中国 41 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制定的“双一流”建设政策文本，从典型特征和存在的问题两大方面进行详细分析和研究^[8]。

有关“双一流”建设的评估问题是目前学术界研究中的另一个热点话题，而其中的学科评估问题受到的关注度最高。张应强在分析学科评估对“双一流”建设中的作用及其限度的基础上指出，需要回归为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而评估的学科评估目的，确立“以评促建、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学科评估原则，特别是要引导和鼓励高校通过改革创新来开展“双一流”建设^[9]。张继平等从学科评估价值取向角度的分析中指出，“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我国高校学科评估正面临着理念性冲突、权利性冲突、任务性冲突和过程性冲突^[10]。刘强指出，我国高校学科评估应当妥善处理好用实用工具理性与学术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强化学术价值理性在高校学科评估中的基础性作^[11]。冯用军等对“双一流”战略的概念框架、分类特征和评估标准进行了相关探索作^[12]。

“双一流”建设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策性问题，因此，对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成效进行评估自然也是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战略中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从上面的代表性文献梳理中可知，目前的研究更多是从应然层面展开的探讨，尤其缺乏从实然层面

展开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基于 36 所高校公布的《“双一流”建设 2018 年度进展报告》（以下简称《2018 年进展报告》）对“双一流”建设的阶段性成效进行评估，探究高校“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策略，旨在为高校下一步的“双一流”建设工作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 36 所 A 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2018 年进展报告》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方法是指通过对研究的文本内容进行系统、客观、量化的分析，进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科学研究方法。就方法的角度而言，内容分析方法包括解读式内容分析法、实验式内容分析法和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法^[13]。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主要运用解读式内容分析法对《2018 年进展报告》进行分析，力图从实施主体的视角呈现“双一流”建设的阶段性成效及存在问题。

解读式内容分析法是一种通过对文本内容进行精读、理解与阐释来传达意图的方法，“解读”的含义不只是停留在对事实进行简单解说的层面上，而是从整体和更高的层次上挖掘与把握文本内容的真正意义。内容分析法要求按照预定计划，建立一定的分析类目，按步骤进行分析。本文的分析过程主要按照以下三个步骤进行：

第一，对样本高校《2018 年进展报告》进行系统、全面的收集和整理，并对报告内容进行清晰、准确的概括与理解。在样本选择上，作者收集了在 2017 年经遴选认定产生的 36 所 A 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2018 年进展报告》。首先，这 36 所高校均是经科学、严格的遴选标准产生的 A 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学校综合实力突出，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其次，2018 年作为高校落实开展“双一流”建设的“元年”，对于奠定高校“双一流”建设基调、及时发现“双一流”建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确立解读式内容分析的分析维度。本研究分为成效评估和问题分析两部分，在成效评估部分，结合高校《2018 年进展报告》的文本结构和《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中的遴选条件两方面，确立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大学文化建设以及国际交流合作六个分析维度；在问题分析部分，结合部分高校《2018 年进展报告》中的自述问题，确立办学资源、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大学文化建设、国际交流合作、学科建设以及制度建设八个分析维度。

第三，运用确立的分析维度对“双一流”建设进展报告进行分析。首先，对报告进行不同内容群比较，即在同一分析维度下，概括、比较不同高校的“双一流”建设成效；其次，对报告进行内容内比较，即对于同一所高校，概括、比较不同分析维度下的“双一流”建设成效。

三、“双一流”建设中的阶段性成效

2018 年是高校“双一流”建设由统筹规划阶段转向全面实施阶段的“开局之年”，高校积极对标国家、省域以及自身的建设方案，有序展开各项“双一流”建设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效。

（一）学科结构不断优化

学科是现代大学的基石，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和根本，因此，一流大学建设必然落实到一流学科建设上来^[14]。高校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以学科建设为基础，充分发挥高校自身的学科优势和特色，精准支持学科建设，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和优化（见表 1）。下面从学科建设理念、学科建设举措和学科建设评价三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

表 1 部分高校“双一流”建设中的学科布局

学校名称	学科发展布局
北京大学	形成了依托人文、社科、经管、理学、信工、医学 6 大学部和深圳研究生院的学科布局战略
清华大学	落实学科分类分层次发展路径，进一步汇聚学科优势、优化学科结构 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化学科布局，撤销部分建设水平低、师资薄弱的学位授权点，新增优势学科化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北京理工大学	增列生物学、法学 2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逐步构建特色优势学科为主干、基础学科为支撑、新兴交叉学科为增长点的学科专业体系
北京师范大学	优化学科布局，停建政治学一级学科；强化优势特色，推进教育和科技融合，打造“教育硅谷”
中央民族大学	分层推进学科建设，以民族学一级学科建设为引领，带动学科整体水平提升，重点建设“民族+”高峰学科 ²
南开大学	加快推进“率先冲击世界一流学科”“巩固发展学科高原”“新兴交叉学科与新增学科”的“7+8+X”学科建设 ³
吉林大学	对 11 个“双一流”建设学科实施重点建设，积极打造以“双一流”学科为龙头的学科体系
哈尔滨工业大学	形成了理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建设格局
复旦大学	初步形成文、社、理、工、医五大学科板块竞速发展、融合创新催生新兴学科的态势
同济大学	对工科、理科、医学与生命科学学科、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进行分类指导、分类管理和分类建设，形成学校总体学科发展定位
南京大学	继续实施“学科亮点工程” ⁴ ，实现学科建设从“高原”向“高峰”的跨越
浙江大学	形成高峰凸显、高原崛起、人才涌现的学科发展格局
山东大学	实施“学科高峰计划”、“学科激励计划”，分层推动优势、特色、新兴交叉学科梯次发展
武汉大学	实施精准支持，积极引导部分学科向优势学科靠拢、稳妥推动部分水平较低的学科转型升级，学科布局进一步优化

¹ 清华大学确立的学科分类领域包括工程科学与技术学科领域、自然科学学科领域、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领域、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

² 中央民族大学确立的“民族学+”学科包括民族学、人类学、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经济、中国民族史、世界民族与民族问题、民族艺术、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族社会学、民族宗教、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等。

³ 南开大学按照“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原则重点建设的 7 个学科群包括化学、数学、统计与数据科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历史学、经济学和工商管理。

⁴ 南京大学确立了包含国家占位型学科、稳中求亮型学科、战略储备型学科在内的学科体系。

重庆大学	基本构建起特色优势明显、结构合理、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学科体系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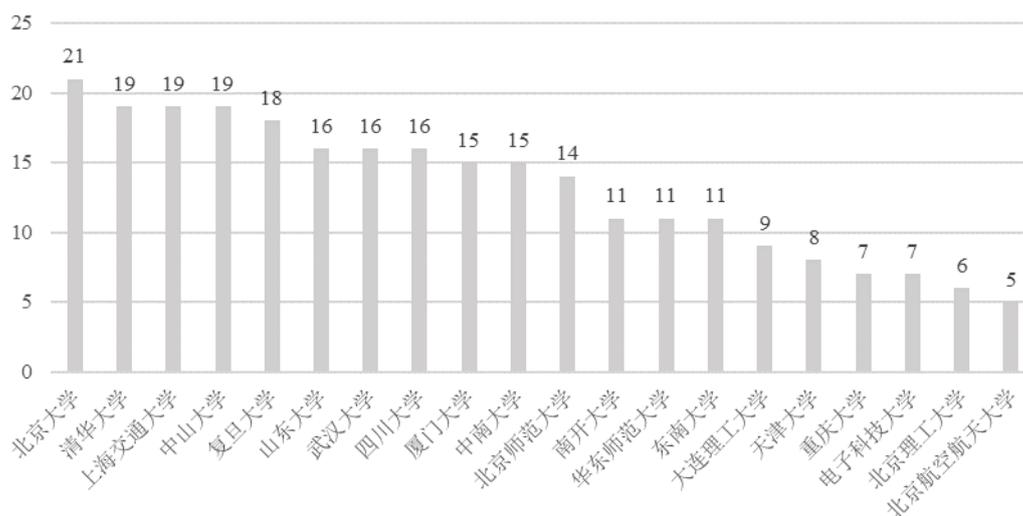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根据各高校的《“双一流”建设 2018 年度进展报告》整理所得，院校排名不分先后。具体参见：教育部官方网站。“双一流”建设高校 2018 年度进展报告公开网址[EB/OL].[2019-3-29].
http://www.moe.gov.cn/s78/A22/A22_ztzt/ztl_tjsylpt/sylpt_jsdt/201903/t20190329_376024.html

首先，在学科建设理念方面，由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转变，学科结构持续优化。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不再唯“规模论”，一味追求学位授权点数量的增加，而是更加关注学科结构和学科质量的发展，调整、撤销部分学科基础薄弱、建设水平低的学位授权点，新增符合学科发展定位和优势学科建设方向的学位授权点，建立学科动态调整机制，激励学科建设内涵式发展。在 2018 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首批 20 所学位授权自主审核高校中⁵，有 19 所为一类大学建设 A 类高校。

其次，在学科建设举措方面，打破学科固有模式，大力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高校立足自身特色，依托区域重大发展战略和学术研究前沿领域，以问题为导向推进一批新兴前沿交叉学科以及学科群发展，重点支持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其中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医工结合成为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热门领域。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成立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院等交叉平台；西安交通大学设立新兴交叉学科建设专项，布局建设信息科学、人工智能、医工交叉等一批交叉学科方向。

第三，在学科建设评价方面，强化绩效意识，学科排名地位凸显。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高校引入第四轮学科评估、ESI 学科排名、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等排名系统作为衡量学科建设成效的主要标准。以 ESI 学科排名为例，在 36 所 A 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有 20 所高校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进入 ESI 学科排名前 1% 的学科数量（见图 1）。

进入ESI排名前1%的学科数（单位：个）



⁵ 20 所学位授权自主审核高校分别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

图1 2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进入ESI排名前1%的学科数

（二）人才队伍引育结合效果凸显

一流大学建设离不开一流人才队伍的支撑，人才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成为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关键要素。高校主要从外部引进和内部培养两方面进行师资队伍建设（见表2）。

表2 部分高校“双一流”建设的人才引进和培育措施

学校名称	人才引进措施	人才培育措施
清华大学	海外人才招聘宣讲会，学术交流平台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国际青年学者唯实论坛，海外校友联络员制度	青年科学家团队支持计划
北京理工大学	实施“人才入校通知单”制度 ⁶	青年骨干教师学术启动计划，“特立青年学者”人才支持计划
中国农业大学	“315”人才计划 ⁷	——
南开大学	百名高端人才支持计划	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
大连理工大学	引进高端人才协议工资制，星海论坛	“星海学者”培育计划
吉林大学	——	培英工程计划，高端人才培育计划
复旦大学	急需人才重点引进计划，光华青年学者论坛	卓越人才计划系统提升工程
同济大学	“四青”人才计划专项行动 ⁸	——
上海交通大学	——	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机制，实施“晨星—优秀青年学者奖励计划”
南京大学	海外招聘会与宣讲会，青年学者前沿论坛	登峰人才支持计划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青年教师出国研修计划，学术领军人才计划
厦门大学	“以才引才”，南强青年学者论坛	——
中国海洋大学	——	青年英才海外培育计划
华中科技大学	国际青年学者东湖论坛，海外人才工作站	学术前沿青年团队支持计划，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学术新人奖”项目
重庆大学	海外引才工作站，海内外优秀青年学者论坛	学科领军人才培育计划，后备拔尖人才引进计划
电子科技大学	海外人才工作站，国际青年学者论坛	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
天津大学	“海河英才”行动计划，海外高参次人才报告会	——

资料来源：根据各高校的《“双一流”建设2018年度进展报告》整理所得，院校排名不分先后。

一方面，高校将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青”人才和海外优秀学者等高层次人才与高水平研究团队作为重要引进对象，通过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专项计划、举办青年学

⁶ “人才入校通知单”制度旨在通过机制创新设计，对入校人才实行账单式服务，打破制度藩篱，填平部门间“焊缝”，形成部门联动机制，增强人才引进工作的快速反应能力，推动人才配套资源快速落实，提升学校对人才的吸引力。

⁷ “315”人才计划指包括讲席教授、领军教授、青年新星三个层次人才岗位，覆盖从青年教师、中青年骨干教师到资深教师的全校各年龄段教师群体的人才支持计划。

⁸ “四青”人才指获得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的优秀青年人才（简称青千、青拔、优青、小长江、青年科学家）。

者论坛以及建立海外人才工作站等形式,积极拓展人才引进渠道与措施。例如,中国农业大学在 2018 以引进高层次人才为重点,推进“315 人才计划”;华中科技大学举办“国际青年学者东湖论坛”,吸引海外优秀人才等。依托丰富的人才引进渠道和措施招揽到海内外优秀学者并不意味着人才引进工作的顺利结束,相反这只是人才引进工作的第一步,更为考验高校建设和发展实力的是人才引进的后续发展、管理、评价与考核,能否为高层次人才创造良好的学术发展环境、能否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对学科发展的引领汇聚作用成为决定高校人才引进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这要求高校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如何广泛招揽人才上,更要从长远角度谋划如何实现人才引进价值的最大化,一些高校在此方面进行了探索。例如,中山大学把“人才强校”作为核心发展战略,制定和修订人才引进和管理规范,进一步完善人才引进体系;南京大学进一步完善绿色通道校内联合论证制度,重点关注引进人才与学科发展契合度、对学科发展所能做出的预期贡献;重庆大学完善“预聘制”体系,强化目标管理,严格考核退出机制等。

另一方面,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离不开内部培育,外部引进重在吸引以数量形式而存在的学科人力资源,内部培育则重在获取以质量形式而存在的学科人力资源^[15]。高校重视青年人才培养,为本校教师的学术研究和职业发展创造条件,促进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内生性”发展。其一,为进一步激发青年学者科研潜力,高校通过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为不同发展阶段的青年教师创造良好的科研发展环境,鼓励一批杰出学者赴世界知名高校进行国际交流与学习,聚焦学术研究国际前沿。例如,北京理工大学的“青年骨干教师学术启动计划”和“特立青年学者”人才支持计划,支持青年教师在学术思想最活跃时期潜心科学研究;四川大学实施青年教师“三个全覆盖”⁹计划,2018 年共派出 107 名青年教师分赴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海外名校访学。其二,尊重教学的基础地位,在师资培养和考核评价过程中突出教学比重,强调不同类型教师的分类发展和分类评价,制定多元化的教师考核评价方式。例如,复旦大学在 2018 年首次实施教学为主型岗位高级职务评聘工作,为在教学为主型岗位上取得不俗业绩和长期奉献的教师开设专门晋升渠道;北京大学始终坚持一流师资承担本科生课程,调整学校原有年终绩效评价方案,将教学占比由 30%提升为 50%。

(三) 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人才培养始终是我国院校重点建设和学科建设关注的重要内容,“双一流”建设高校立足人才培养定位,以课程思政建设为价值引领,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本科阶段以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为依托,全面推进实施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改革,建立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融合的课程体系,为学生搭建可供选择的基础知识培养平台。例如,浙江大学在 2018 年新增 16 门通识核心课程,重构“6+1”通识课程体系¹⁰;复旦大学明确本科生“2+X”¹¹培养

⁹ “三个全覆盖”具体指科研启动经费全覆盖、导师制全覆盖、博士学位与海外经历全覆盖。

¹⁰ 浙江大学发布的《通识教育白皮书》中指出,通识课程体系由通识必修课程和通识选修课程组成,前者包含了思政类、军体类、外语类、计算机类、创新创业类、自然科学类等 6 类,后者则包含了中华传

方案，从通识教育和专业培养两方面入手夯实学生发展基础；西安交通大学则建立“通识教育+宽口径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

与本科教育相比，研究生教育作为最高层次的知识创新教育，在培养过程中更加注重专业能力和科研能力。高校在研究生培养环节中突出过程评价，强调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创新性和研究性，实施一系列研究生专项科研计划。例如，厦门大学实施了“南强优秀博士生培育计划”、上海交通大学实施了博士生“致远荣誉计划”¹²以及南京大学实施的优秀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等。同时，以实践能力为基础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改革，实践基地建设成效显著。例如，清华大学2018年新建了18个研究生专业实践基地，强化专业实践环节；西北工业大学支持建设8个国家级和省级示范性实践基地，探索“政府牵线、校企对接、项目聚人”的协同式研究生培养新模式。

（四）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一流的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基础与保障。高校科学研究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服务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同时，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不同于其它机构一般的社会服务形式，其根本区别便在于高校以各项科研成果作为社会服务的主要手段。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以基础研究为根本，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促进应用研究，实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融合创新，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例如，南京大学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原始性创新体系；重庆大学积极贯彻落实国家部委要求，加强基础研究，2018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近250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各类项目30余项。同时，高校借助学科交叉发展的契机，积极推进交叉学科科研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学科优势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例如，四川大学加快推进交叉创新基地培育建设，3个创新基地进入建设期¹³；南开大学则启动新物质创造等交叉科学中心建设，构建南开特色的交叉研究体系；浙江大学支持“大数据+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等。

作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智力支撑，高校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也要厘清理论研究成果和现实生产力转化之间的关系。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借助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第三方平台，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质量，实现高校自身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赢”，发挥高校社会服务功能的独特价值性。例如，华中科技大学规范科技成

统、世界文明、当代社会、科技创新、文艺审美、生命探索和博雅技艺等“6+1”类。

¹¹ “2+X”本科生培养体系中，“2”是指从通识教育和专业培养两方面夯实个人发展基础。“X”是指为学生个性化成长提供专业进阶、跨学科发展、创新创业等多元发展路径。专业进阶路径可选读多种专业进阶课程模块，或更具挑战性的本科荣誉项目。跨学科发展路径可选读多种跨专业主题课程，或更系统的双学位项目。创新创业路径可选读多种特别设计的创新创业课程。

¹² 上海交通大学从2018年起实施博士生教育“致远荣誉计划”（简称“荣誉计划”），旨在培养一批具有宽阔视野、科学精神、创新能力与社会责任感未来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军人才，推动博士生创新培养体系建设。

¹³ 分别为疾病分子王立前沿科学中心、四川大学-联想（北京）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和四川大学材料基因组研究中心。

果转化工作，在 2018 年完成审批、签订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合同总额近 6 千万；同济大学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流程，探索成果转化新模式，提高社会服务能力；清华大学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产学研合作与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体系和保障机制。

（五）大学文化建设有序推进

一般认为，大学文化可具体化为大学精神文化、大学制度文化和大学环境文化，三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强化^[16]。大学文化建设作为一种隐性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建设项目，贯穿于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全过程。一流大学文化是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灵魂和精神内核，从宏观层面来看，它不特指某一领域的具体概念，而是高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等方面的综合体，以一种“缄默”的方式影响着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具体实践和价值选择。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核心，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立足高校自身发展特色和历史文化积淀，面向世界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育人体系。

一方面，高校坚持正确的文化导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在一流大学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并以校训为引领，构建校风教风学风一体的文化育人体系。例如，东南大学的涵盖校训精神研究、校史故事挖掘等在内的“校训文化育人”体系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文化育人”建设项目等，以此为师生创造共同的文化场域，内生化解对高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另一方面，高校文化建设和自身的发展历史与方向、办学特色密切相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流大学文化建设不是按照固定模式千篇一律进行的，而是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开展并形成一系列体现高校自身精神内核的校园文化品牌活动。例如，兰州大学确立 36 项校园文化建设项目，制作《百年兰大人》等系列原创视频和话剧，全方位展示新时代兰大精神；北京理工大学传承弘扬大学精神，培育打造全新的“百家大讲堂”校园文化品牌等。

（六）国际交流合作持续开展

高校国际交流合作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其实质在于高校之间在办学理念、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进行跨地域和跨国别互动的动态过程。“双一流”建设目标的提出给高校国际交流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高校在服务人才培养和打造科研高地的过程中有了更明确的目的性和指向性^[17]。国际交流合作一般包括三个层面：日常的国际交流合作、学生的国际交流合作和师资队伍的国际交流合作。下面分别进行阐述：

第一，高校以服务国家战略、共建国际科研合作平台、牵头举办并参加国际学术论坛等形式，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实现国际交流合作形式的更加多样化，交流合作广度和深度向纵深发展，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例如，北京大学在 2018 年初步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格局；清华大学举办首届亚洲大学联盟研究生学术论坛；中国海洋

大学与挪威卑尔根大学等 18 所高校签署合作协议，国际合作空间不断拓展。

第二，高层次人才是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提高竞争力的“有力武器”，高校进行国际交流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吸纳国际优秀教育资源，在人才培养环节突出全球视野和全球格局。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推进与海外一流大学的联合培养，2018 年选拔 850 名优秀在校生赴海外学习；同济大学推进与国外高水平知名大学的双学位项目，博士生国际交流覆盖率达 100%，硕士研究生国际交流覆盖率达 50% 以上。

第三，作为人才培养的主力军，师资队伍建设的国际化是高校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基础，高校通过海外引智工作、组织教师参加海外交流学习等方式，创造“本土师资国际化、国际师资本土化”的发展条件。例如，南京大学将“引进来”与“走出去”两种战略相结合，通过专项支持计划柔性引进国际一流专家、学者来校，同时选拔资助青年教师到世界知名高校进行长期研修。山东大学实施海外引智计划，增设境外专家科研流动岗，开展国际科研合作和教学。

四、“双一流”建设中的问题剖析

在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各高校都取得了一定的建设进展和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高校全面落实“双一流”建设的探索初期，各高校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一些突出矛盾与问题。在 36 所 A 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2018 年进展报告》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 26 所高校在报告中对自身 2018 年“双一流”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自我剖析。那么，目前各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存在哪些问题？本部分将结合各高校的“自我陈述”展开分析。

结合高校各项具体建设和改革工作，本文从办学资源、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大学文化建设、国际交流合作、学科建设以及制度建设 8 个一级维度对上述 26 所高校在《2018 年进展报告》中的自述问题进行分析，具体见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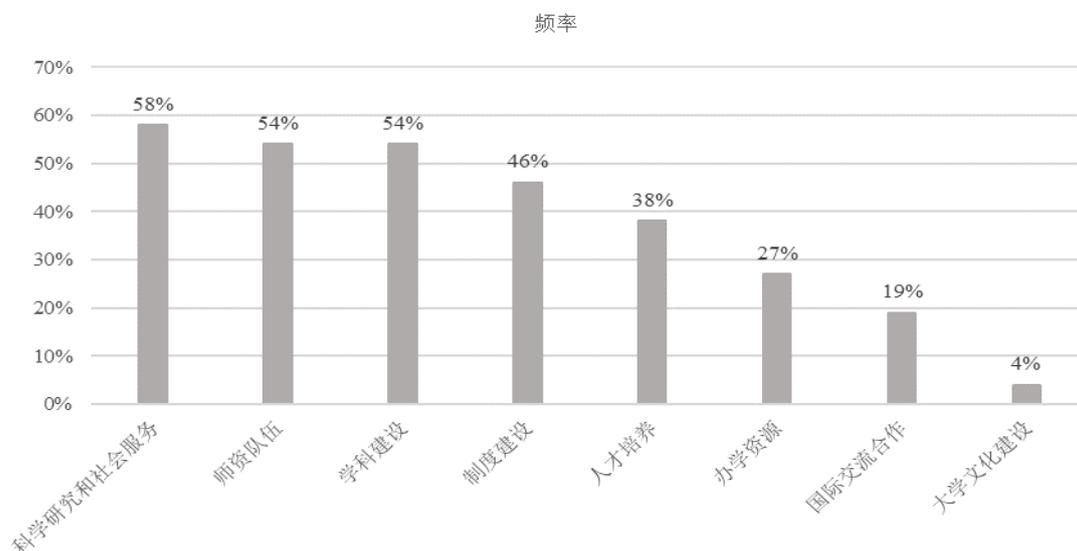


图2 样本高校《2018年进展报告》中自述问题维度频率统计

从图2中可知,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58%)、师资队伍建设(54%)、学科建设(54%)以及制度建设(46%)四个方面在26所高校自述问题内容中占比偏高,这既表明高校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也从侧面反映出高校对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以及制度建设的重视程度。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尽管有的维度占比较低,例如大学文化建设(4%),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大学文化建设方面问题不突出,相反,作为一种隐性资源的文化建设始终是高校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薄弱环节。

在对26所高校自述问题内容进行类别统计之后,本文又将8个一级维度划分为18个二级维度,在此基础上对“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自述问题进行细化分析,见图3所示。

因篇幅所限,下面主要从与“双一流”建设成效密切相关的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制度建设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四个方面重点展开进一步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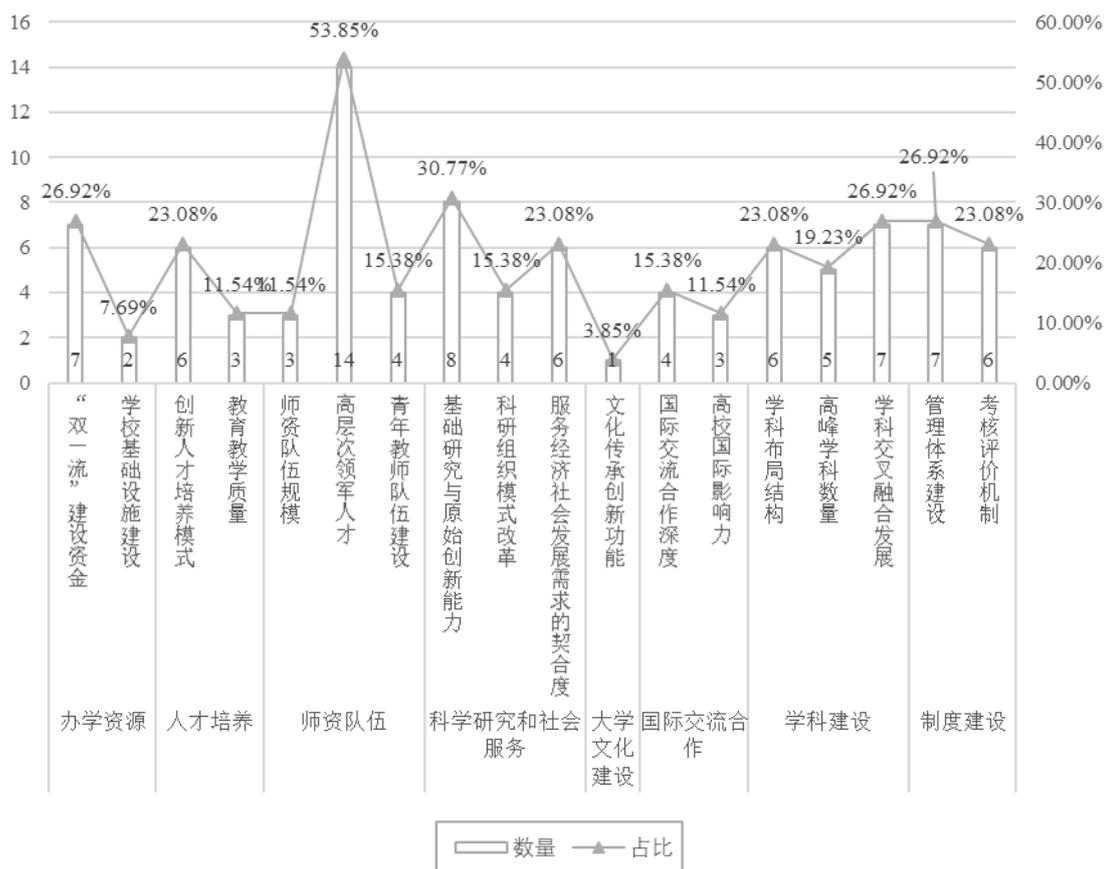


图3 样本高校《2018年进展报告》中自述问题二级维度频率统计

（一）高层次师资队伍建设矛盾突出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指出,“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这充分凸显了人才战略在“双一流”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通过对《2018年进展报告》中的分析发现,“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师资队伍建

设中面临着两重矛盾：第一重是高校对高层次人才的广泛需求与高层次人才数量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随着高校师资队伍建设规模逐渐满足学校教学和科研的基本需求，高校转而追求师资队伍建设质量的提升，作为学术界“精英群体”的学科带头人、高层次领军人才成为高校追逐的对象。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自述问题中指出“高层次人才数量不足，特别是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顶尖人才和领军人物不多。高层次人才后备队伍基础薄弱，人才培养任重道远。人才队伍的学科分布不均衡，传统优势学科人才队伍建设滞后。”；中央财经大学指出“受学校办学条件以及兄弟院校不断加大的高端人才建设力度等客观因素限制，学校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进展不大。……学校自身高层次人才的培育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积累。”；重庆大学指出“教师总量不足，高水平人才及青年人才偏少等问题”；西北工业大学指出“高层次人才不足，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优秀青年教师较少，有影响力的学术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匮乏，高端人才引育、高水平团队建设成效不显著”。

第二重是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迫切性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长期性之间的矛盾。人才培养过程是一个需要不断的积累和投入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我国“双一流”建设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周期性，为了达到既定目标，高校倾向于选择一条相对容易的“道路”——人才引进。通过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下的多方引才，高校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双一流”建设指标，但如果一味依靠这种以“重金挖人”为核心的粗放式人才引进模式而忽视自身对高层次人才的培育，那么各高校之间将会陷入高层次人才争夺的“混战”，长此以往，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人才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从而产生“马太效应”。尤其是对于中西部地区的高校而言，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例如，兰州大学在自述问题中提到“队伍建设仍是学校发展的最大短板，高层次人才匮乏，青年优秀人才储备不足，学缘结构不合理。”；西安交通大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高层次人才规模距离学校发展目标还有较大差距，难以发挥对一流大学建设的引领作用；……引才的竞争日趋激烈，学校人才引进的难度逐年加大”。

（二）学科建设内生动力不足

学科建设是“双一流”建设的基础，高校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的学科建设问题可以归为纵向和横向两方面。从纵向层面来看，部分高校高峰学科数量不足，无法发挥优势、顶尖学科的集群效应从而带动其他学科或学科群的有效发展。我国高校与高校之间以及各高校内部的学科系统之间都呈现出显著性差异，这也决定了高校在现阶段不可能实现学科的“平均化”发展，必须集中有限的资源打造比较优势，继而发挥优势、顶尖学科的带动和辐射效应。例如，北京理工大学在自述问题中提到“高峰学科数量不足，覆盖面窄，优势学科主要集中在工科，无法带动学校学科和学科群整体发展”；西北工业大学在自述问题中提到“高峰学科缺少，高原学科（群）建设乏力”；浙江大学指出“学科内涵式发展的促进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高精尖导向和重点方向凝练不够，顶尖学科尚未真正形成”。

从横向层面来看，高校难以突破原有单一学科发展模式，学科交叉融合发展不深入，阻

碍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壁垒依然存在，发展动力不充分。例如，复旦大学在自述问题中提到“学科融合创新发展的基调虽已确立，但促进交叉、合作、协同的措施和条件还有待优化”；天津大学在自述问题中提到“鼓励理工结合、理工与人文社会科学结合的学科交叉融合机制还没有形成，新兴学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学科综合性不强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浙江大学在自述问题中提到“学科交叉会聚有待加强，学科、人才、科研深度融合互动的创新生态系统还需加快构建。”；哈尔滨工业大学在自述问题中提到“组织推动学科交叉融合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西北工业大学指出“新兴（交叉）学科缺乏，对国际学术前沿和人类社会发展急需的学科领域布局不足”。这和高校进行“双一流”建设的推动力密切相关，学科交叉与融合以“问题导向”为基础，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与挑战是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与此相反，我国高校开展“双一流”建设更多的依赖于国家宏观政策的推动，是在被动环境下的主动适应，并不是源于高校内部存在的现实问题。

（三）制度体系建设不完善

从图2可以看出，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制度建设问题主要表现为管理体系建设和考核评价机制两方面。从管理体系建设方面来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不顺畅，基层组织活力不足，如何处理好学术与行政的关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强院系自主权是目前存在的典型问题。受传统科层制管理模式的影响，校、院、系三级按照从上到下的职位等级各司其职，各层级之间相互分离，校级机构作为最高层级位于权力的中心，院系自主权薄弱，而科层制下的明确分工和严格管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的学术自由。例如，浙江大学在自述问题中指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有待进一步深化，学校办学自主权需要进一步落实与扩大，基层组织活力有待增强，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有效发挥作用的保障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北京理工大学指出“在大学治理方面，促进内涵式发展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有待持续构建，实施工作机制和监督考核有待深入完善。”；中国农业大学指出“内部治理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学校管理部门的服务效能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学院、学科在建设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学科发展内生动力仍需进一步释放。”；南开大学指出“当前学校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综合改革推进的步伐还不够大，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阻碍学科群发展的壁垒依然存在。”；东南大学指出“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健全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从考核评价机制方面来看，作为“双一流”建设工作的指挥棒，高校考核评价机制缺乏创新，绩效考核与动态调整相结合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制度建设是确保高校有序推进“双一流”建设工作的重要保障，从资源统筹配置到评价激励机制建设再到内部治理体系等各个方面都离不开制度建设。例如，北京大学在自述问题中指出“学科建设是一个长期和系统的工程，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一直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下一步学科动态调整的依据，迫切需要摸索出一套科学、合理、有效的评价方案。”；清华大学指出“要改革和完

善学术分类评价体系，根据教师所在学科特点及其学术研究工作属性，重新修订和完善学校相关意见及院系学术评价标准”；复旦大学在自述问题中指出“评价激励机制不够完善，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还需要进一步激发”；兰州大学在自述问题中指出“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各类评价制度相对独立，尚未融合成为一套整体的、系统的评价体系”；南京大学指出“在推进“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评价体系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如何有利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重大成果的产出、如何有利于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重大课题、如何有利于有传世价值的高质量成果的培育，如何加强学术工作的“工匠精神”等等，这些都需要创新考核评价机制。”

（四）服务社会需求的能力有待加强

产生于 20 世纪初期的“威斯康星思想”主张大学应该利用自身的知识创新和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尽可能帮助解决社会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18]。一流大学建设离不开一流的社会服务能力，通过《2018 年进展报告》中的分析发现，部分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仍存在基础研究能力相对薄弱、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学校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等典型问题。例如，浙江大学在报告中指出要“提升重大战略需求服务支撑能力，坚持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和区域重大需求，深入实施创新 2030 计划，谋划建设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重大科创平台。”；天津大学在报告中指出“在国家重大需求、国际科技前沿领域的集成优势尚未凸显，有利于培育和组织大项目、大成果、大团队的科研组织模式改革亟待深化。”；吉林大学在报告中指出“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发展的能力不强”；华东师范大学在报告中指出“服务支撑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贡献度和显示度仍旧不足”；中国农业大学在报告中提到“满足国家重大需求，解决重大科学难题和产业关键问题的能力仍需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校企合作联合攻关和多学科协同创新的能力仍有欠缺”；东南大学指出“作为以工科为主要特色的高校，为国家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支撑能力还需进一步加强。”；哈尔滨工业大学指出“领跑国际科技前沿和服务社会的科研组织模式创新还不到位”；中国海洋大学指出“学校直接服务经济社会、驱动产业发展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兰州大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学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承接国家重点项目及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有待提升”。如何进一步提高服务社会需求的能力，加快与新经济、新产业的契合度成为高校下一步“双一流”建设工作的重要议题。

五、高校“双一流”建设中的改进策略

（一）强化价值引领，突破工具理性下的路径依赖

在分析“双一流”建设政策理念时，可以借鉴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这一对概念。工具理性主义范式主要指行动主体具有明确的目的指向性，通过可量化、可计算的方式寻求实现目标最大化的最优途径，但在这个过程中并不看重自身所选行为的价

值，而更看重所选行为能否达成预设目的，因此往往会忽视情感和价值追求。而在价值理性主义范式下，社会实践主体在社会活动中对某种固有价值信守和承诺则来自行动主体对自身价值的体悟，建基于高度的自我自觉意识之上^[19]，因此，实现理想化价值目标成为社会实践主体活动方式的价值导向。一流大学建设不仅包括外部绩效指标、学术研究成果数量等外部显性建设，还包括大学理想、大学精神、学科文化、学术氛围等内部隐性建设。对外在显性指标的建设和追逐虽然可以使高校在短期内看到成效，并随之带来资源和声誉的最大化，但长此以往，高校的内在品格可能会受到“腐蚀”，失去自身办学特色，不利于整体的长远发展。在工具理性主义取向下，高等教育发展以政府主导为主，技术化、工程化特色明显，重点建设资源控制和分配“国家中心模式”，会造成高等教育治理目标的外向性，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和治理手段的功利化等多重风险^[20]。高等教育发展需要格局、情怀和远见^[21]，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应强化价值引领，不应拘泥于对短期成效的追求，突破工具理性下的路径依赖，立足办学定位和自身优势进行系统规划，重视大学文化建设，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努力营造追求卓越、追求内涵、追求情怀的学术研究氛围和校园文化氛围，创造多元汇聚、平等交流、多方支持、人文关怀的学术科研环境和育人环境。

（二）弱化外在表现倾向，激发高校内在动力

在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新阶段，单纯靠扩大规模、增加体量的“老路”已行不通，新阶段高校应将发展重心落在内涵建设和凸显特色上来^[22]。高校的内涵建设意味着每一所高校必须充分结合自身的区位特点、办学历史、学科特色及院校文化等“综合约束”，找准自身的“生态位”，实现特色发展和内涵发展。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一些高校办学定位并不清晰，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办学特色弱化，同质化倾向明显等典型问题。这些问题若得不到根据解决，存在这些问题的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将变得越来越被动，越来越缺乏核心竞争能力。高校的核心竞争能力与体量、规模、校园面积、经费总额度等外部指标没有必然联系，而主要取决于高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在外延式发展范式下，学校如同舞台上的“表演者”，作为“被看”的一方，要表现出“观看者”所需要的品质和能力，有“观看者”所期望的表现^[23]。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具有明显的表现意味，更多的迎合外在化的需求，为了获取社会和他人的认可而改变自身的标准和规范。高校应弱化外在表现倾向，坚持问题导向，以自身需求作为建设的出发点，激发内在动力。一方面，高校需进一步推进考核评价机制改革，完善综合多元化的评价模式，深化教师考核评价改革，坚持分层、分类、分学科合理设置考核和评聘标准，鼓励教师潜心教学科研工作，为教师的成长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使其主动参与到“双一流”建设工作中。另一方面，高校应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机构，以学院为建设主体，扩大学院自主权，明确院系主体责任，在“双一流”建设中充分发挥院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积极性。我国高校众多，类型多样，层次多元，不同高校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各不相同，但无论是哪所高校，均应将发展重心落在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上来，坚持久久为功，不断探索新的特色发展道路。

(三) 立足区域发展，提高服务国家和社会需求的能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新阶段，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式也由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阶段向质量提升的内涵式发展阶段转变过程中。在新的历史阶段和时代背景下，不断提升高等教育主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能力和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发展质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24]。从进一步提升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方面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尚未建立起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自主调节机制，高等教育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方面仍有较为广阔的提升空间，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家地位不相匹配。杜玉波委员指出，国家深入推进实施的“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成为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也为高校服务社会需要提供了广阔舞台。随着这些年来规模的快速增长，我国高等教育的服务发展能力也逐步增强，但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结合不够紧密的问题仍然突出。^[25]比如，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十分紧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人才培养不足。2018年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加强对各类需求的针对性研究、科学性预测和系统性把握，主动对接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应加强管理，注重高校社会服务的机构与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智囊团”作用，不断探索完善社会服务模式。另外，高校需强化动力机制，积极推动国家重大平台建设，建立权责分明的激励机制，主动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总之，高教领域和科技领域要紧紧瞄准世界科技前沿，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打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学科之间的壁垒，以机制改革为抓手和突破口，不断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4] 褚照锋. 地方政府推进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的策略与反思——基于 24 个地区“双一流”政策文本的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7(08):50-55+67.
- [2] 阎凤桥. 我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制度逻辑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 2016(11):46-50.
- [3] 吴小玮. 省域“双一流”建设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7(08):56-60.
- [5] 苏林,杨佳乐,高耀,王立. 省域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政策中的突出特点、典型矛盾及破解策略[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8(02):38-44.
- [6] 彭华安.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双一流”建设政策研究[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8(03):77-83.
- [7] 张伟,张茂聪. 我国“双一流”建设的省际政策比较——基于 26 省“双一流”实施意见的文本分析[J].高校教育管理,2018,12(04):19-26.
- [8] 李春林,槐娇娇.中国高校“双一流”政策文本量化分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9,37(07):1-6.
- [9] 张应强. “双一流”建设需要什么样的学科评估——基于学科评估元评估的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

究,2019,(05):11-18.

[10] 张继平,徐桑梓.“双一流”建设视域中学科评估价值取向的变迁与冲突[J].现代教育管理,2019,(11):37-42.

[11] 刘强.“双一流”建设视域下高校学科评估的价值冲突及其调适[J].现代教育管理,2019,(11):43-48.

[12] 冯用军,赵雪.中国“双一流”战略:概念框架、分类特征和评估标准[J].现代教育管理,2018,(1):12-18.

[13] 邱均平,邹菲.关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02):14-19.

[14] 高耀.学科评估机制失衡的效率损失与补偿策略——兼论一流学科建设的路径取向[J].中国高教研究,2018,(1):23-27.

[15] 龚怡祖,谢凌凌,陈金圣,常姝.大学学科运行与学科发展战略中若干问题的理论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1,32(10):38-49.

[16] 眭依凡.好大学理念与大学文化建设[J].教育研究,2004,(3):14-21.

[17] 徐涔琳.“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高校国际交流合作[J].教育教学论坛,2018(29):3-4.

[18] 潘懋元.新编高等教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6-41.

[19]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106.

[20] 张洋磊.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的工具理性主义特征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7(2):32-37.

[21] 方跃平.“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价值的当代建构[D].中国矿业大学,2019.

[22] 高耀.简单合并与高校内涵式发展不符[N].中国教育报,2020-5-19,第02版.

[23] 高德胜.表现的学校与教育的危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37(06):16-26.

[24] 高耀.以改革为抓手提升高教服务国家能力[N].中国教育报,2020-5-28,第02版.

[25] 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国家能力——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N].中国教育报,2020-5-24,第01版.

Phased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and Problem Analysis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36 universities'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2018 Annual Progress Report"

Gao Yao, Wang Lili

(School of Education,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is not only a theoretical issue, but also a policy issue. Evaluating the staged effectiveness of the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 focus issue that needs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overall promotion of the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text of the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2018 Annual Progress Report" of 36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using the interpretiv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show that the staged results of the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 asp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is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the effect of int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in talent teams is outstanding, the effect of talent training is remarkable, the abil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ocial services is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 university cultural construction is promoted in an orderly manner,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re continuously carried out.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also faces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great contradic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teachers, lack of endogenous motivation in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mperfect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e ability to serve social need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In the next step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value leadership, inspiring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serve the needs of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Keywords: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problem analysis, progress reports

作者简介: 高耀 (1983 -), 男, 陕西榆林人,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从事研究生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 王莉莉 (1996 -), 女, 山东济宁人,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从事研究生教育政策研究。